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主编 陈思和

2001年中国最佳

散文

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 年中国最佳散文/陈思和主编.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5313-2403-2

I. 2… II. 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081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字数: 260 千字 印张: 11 插页: 2
印数: 1—6 000 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封面设计: 耿志远
印刷监制: 张 斌

责任校对: 刘亮亮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403-2/I·2105

定价: 18.00 元

总 序

陈思和

公元 21 世纪的脚步悄然走进我们疲惫不堪的生命旅途，这虽然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时刻，但当我们身处 2001 年年底来盘点新世纪第一年的文学成果时，却多少有一些若有所失的怅然。春风文艺出版社耗巨资推出“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 年最佳”十种，以期能为新世纪文学创作留一珍贵痕迹。我受命于朋友们的信赖，担任了这一大系的主编工作，约请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把卷展读，兢兢业业，不敢有任何的轻怠。越读到后来，就越感到难以下笔总结。这一点感觉，我的几位担任分卷主编的朋友们也有所知，只要读每卷序言便不难体会到这种难以言说的意思。

当然这并非是说，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并无创意。只是

与新世纪的中国内地在经济上加入世贸、体育上足球出线、外交上申奥成功等一系列象征“国运”的喜庆相比，与理论界有关“全球经济与本土民族化”、“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热烈争论相比，文学创作似乎过于平淡，甚至没有轰动一时的争鸣之作。因而在今年以来，表面上看去是文化兴而文学衰，无所不包的文化批判大有取代文学当年所承担的社会全能的趋势。而文学似乎难以与时俱进，无法积极应对时代提出的新的挑战。但也有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这正是我们的文学开始成熟了。正如一个洞察世故的成熟的人一定是我行我素、处惊不变的人。稍经一点风浪就大喊大叫的，总不外是没见世面的毛头青年。全球化究竟会给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新问题，目前谁也难以预料，而生活还没有充分展开的现象要求在文学上加以深刻的揭示，也是勉为其难。我们自然可以从政治家或者理论家那儿找来一些观点、逻辑以及外国的经验材料，然而这与生活实际所展示的丰富性相比，毕竟显得又表面又肤浅。文学如果从观念出发来揭示所谓的“社会生活本质”，虽然会一时哗众取宠，却不可能真正展示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真实性。我们的文学正处于无名时代的文化状态下，其不可能像共名时代那样，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世界观。人们对生活本质性的关注早就让位给对生活具体细节的感受，这就必然要求多元化，感性化，要求文学创作善于从具体的生活现象中，揭示出作家对生活的感受程度。文学是否需要来应对时代的挑战？它应该如何来应对时代、以致调整与历史进步的关系？显然，这不一定是文学所必须回答的。文学创作自有自己的

艺术审美规律，不能也不必要按照历史进程的规律而盲目追随，上一世纪的文学史经验教训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两种对文学的评价观点，其实都生成在我的脑中，盘桓在我的心间，分裂着我的情感。本来在上一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已经有了普遍共识的文学本体观念，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似乎又有了重新讨论的可能。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学者，如果我们无法概括出一点能够涵盖主要社会症状的社会矛盾规律，那么我们如何来衡量文学作品对社会的深刻理解？如何来评价作家面对生活的创作动机和创作心理？回顾上一个十年之初，当一种深沉的挫伤感折磨了作家最敏感的心灵痛处时，我们读到了像《心灵史》、《叔叔的故事》、《九月寓言》、《我与地坛》等最让人们激动的作品，在形似涣散的精神状态下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依托了民间大地的滋养决然而起，这是记忆犹新的历史。然而，当历史平安过渡到新世纪，这样的深沉感被严重蚀化了。当然我们不能说 21 世纪之初风波不兴，但与我们切身的关联似乎不多。与上一世纪相比，确实，一百年前戊戌之痛庚子之乱辛丑之耻的记忆已经淡漠，九十年前辛亥之变共和之梦的激情已经过时，八十年前外争强权内惩国贼的愤怒已经消解，七十年前外祸内乱明末历史重演的忧虑已经陈旧，六十年前河山破碎杜鹃泣血的刺激已经遗忘，五十年前百废待兴强国之梦的狂热已经破灭，四十年前闭关锁国夜郎称王的梦呓已经清醒，三十年前浩劫当头群魔乱舞的恐怖已经消散，二十年前死里逃生般的洋插队狂潮已经平息……一百多年来中国被强制性纳入世界性格

局以后，像恶鬼般苦苦纠缠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无非是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即如何治愈痛到心灵深处的弱国受辱的创伤。然而，当新世纪悄然来临时我们的百年情结似乎突然释放了，于是我们兴高采烈，顿时失去了许多记忆。于是我们这个民族中的有些人，在“9·11”事件发生之初，会有人对灾难幸灾乐祸地窃笑，当海峡两岸偶有风波之时，会有人摩拳擦掌闻鸡起舞。魔鬼在原始正义感的旗帜下又一次利用了人类的盲目和狂热，使人类理性和民族自省注定要经历另一场严峻考验。我感到困惑的是，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寻着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未来历史规律，匆匆预言未来生活的本质性矛盾时，对这些弥漫在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复杂心理却漠然置之。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冲突，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对未来历史发展的共识，但如果用这样的理念涵盖了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理论又一次走在创作的前面，那么，对文学创作究竟是祸是福？我总觉得中国眼下的景象有点不自觉地重复着中国 30 年代的历史旧象，具体的证据不必在这里说，关键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否走出历史划定的怪圈？这就是世纪之交时鲁迅传统和鲁迅精神引起激烈争论的最深刻的社会原因，我想，也是知识分子将如何在新世纪继续薪传人文理想的最直接的社会原因。

随着中国进入 WTO，全球性的经济体制肯定会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否可以由此推论，以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全球化与本土民族的矛盾？我觉得要考察这个历史事实也必须充分意识到另外一个历史事实，即中国的全球化问题是在追求现代化的前提下发生

的，事实上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地追求现代性，都是全球殖民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别无选择的道路。我们每一步行走都伴随了痛苦的代价，但又是摆脱东方亚细亚式的野蛮与专制的必要过程。鲁迅在 30 年代就告诫人们，不要在宣传沦为民族奴隶的痛苦时忘记了做自己人的奴隶也同样是痛苦的。这些现象的复杂性就在于无法用浅显的方程式排列出社会现象的正反两面是否等值，复杂现象很难用理论形态来说明，于是我们就需要文学，需要艺术家们用含混但又是极为丰富的艺术形象来表达日常生活给予我们的复杂的审美感受。

文学研究者要对文学形象的独特性进行透彻分析，就离不开对生活的透彻的理解。而如果从一个理论观念出发去看待生活现象，或者用孤立、互相割裂的视野来考察生活中现象，都很容易片面放大生活中的某一个或几个因素，而不能尽可能全面地历史地考察生活现象。虽然，这不是文学的任务，也不是文学研究者的任务，文学创作者真正关心的是他对生活的全部感受是否能够准确完整地表达出来，文学研究者的工作是考察这些艺术感受是否能够唤起相应者的感情的共鸣，由此来决定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用旧俄时代的文学史为例子，惟有诞生了奥勃罗摩夫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才有可能产生出对奥勃罗摩夫性格的不朽的分析，从而才会产生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旧俄社会的透彻批判的精神影响。一切都不能倒着运转。一个时代不管其伟大还是不伟大，都会以极其丰富复杂的内涵来滋养文学家的心灵，关键在于我们的文学家是否真正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从这样的意义来理解文学，我在前面所列出的盘桓于心间的两种感受也许并不矛盾，因为一个真正直面生活本身、与广大社会底层的人类呼吸与共的艺术家，他本来是不会舍弃那种来自生活、又是与生命血肉相连的艺术感受，而他所要舍弃的，恰恰是来自生活以外的属于人类观念性的因素。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讨论文学，那么，从上一世纪的 90 年代以来，文学创作所发生的悄悄变化正是趋向这一轨迹。放弃高调，脚踏实地，以具体的个别的感性的艺术追求来开辟文学的新境界。从我们所选的十卷文学大系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这一变化的痕迹。换句话说，新世纪第一年的文学创作，正是上一世纪文学走向的顺理成章的自然发展。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中，作家们依然沿着原来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用独特的敏感来体验着日常生活的刺激。我们在编选大系的过程中故意不推荐那些乌托邦色彩过于浓厚的作品，相反，有些让人读之感到震动的艺术作品，恰恰是显得有些陈旧的内容。如中篇小说卷收入的《奔跑的火光》（方方著）和《玉米》（毕飞宇著）两部小说所描写的农村妇女的命运，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惟其是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才显出中国妇女命运的可叹可泣。《奔跑的火光》的故事发生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一方面是商品经济使农村妇女产生了追求物质与自由的欲望，失去了原始的道德感的乡间娱乐也使她们有了赚钱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在一个经济上比较富裕、男性农民不需要去“南方”打工的农村环境里，传统的生活观念又是何等野蛮地制约了人们的命运。一个现代背景下发生的古

老悲剧，不能不让人对当下生活产生深刻的反思。我们再读散文卷里所收的长篇对话《杜高档案》，讲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微不足道的真实命运，但惟其真实性，才使我们从中感受到档案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可怕的威慑力，让人毛骨悚然。这样一些问题虽然属于历史，但对当下生活的认识，能说是已经过时了吗？相反，过于贴近当下生活的故事，有时也未必能产生真实的力量。我在审读短篇小说卷时删除了一篇曾被有关杂志看好的作品《找打》，这篇小说反映民工遭受现代资本家欺压的遭遇并非没有价值，构思中也不乏吸引人的独特性与巧合性，但问题在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技巧总是在情节上制造出为了强调效果而编造的夸张痕迹，使艺术感染力不能不受到损害。即使在入选的《马义的眼泪》和《拉车人车小民的日常生活》两个短篇里，这样的夸张痕迹仍然是在所难免。我同样很赞成艺术必须接触人间苦难的说法（之所以选这两个短篇，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审美考虑），但是我仍然希望看到人间苦难与心灵感受这苦难的过程中所涌现的灵魂大搏斗和大痛苦，那是不应该为技巧所侵害的一种纯粹的艺术境界。

我们注意到当前的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多少代表了文学的主流，也就更加能反映出某种客观的束缚，于是在选择中较多地有意于体现民间立场与个人立场的好作品，而在诗歌、儿童文学、网络文学等卷里，选择的余地则要更大一些，那里的发表空间要宽阔得多，从而也更能体现出创作心灵的自由形式。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新世纪文学的面貌，我们还特地设置了与中国内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

不一样的中国台湾文学、中国香港文学^①和翻译文学等卷，以另类的姿态与中国内地的文学创作正好形成比较和对照，使我们的读者更加直接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学，感受到文学的丰富性和心灵的丰富性。只有在文论卷里，我们稍稍涉及了一些知识分子所思考的宏大理论，但也是反映了文学评论领域的各类意见，并非有什么导向性的意见。

这次所选的各类文学作品，涉及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如在我们内地的出版历史上，从未有过专门的翻译文学、中国台湾文学、港澳文学、文学理论等领域的编年体文集，所以这项编辑大系的工程给我们带来一定的难度，因为没有经验，遗珠之憾总是难免。但我还是要感谢我的合作者，他们的辛苦劳动推动了这项工作，使这十卷书能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套大系的编选原则与我们以前主编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基本相同，那就是充分注重编选者的个人审美态度，不随大流，更不随媒体的宣传，凭独特的眼光来考验文坛也考验编选者自己的声誉。每年一辑十卷，雁过留声，方方面面地保留下新世纪文学的信息，为当今文学创作保留一份坚实的行走脚印。

2001 年 12 月 4 日于黑水斋

①本卷原来安排是港澳文学卷，后因没有入选澳门文学，所以改为香港文学卷。

序

张新颖

6月的一天，打开电脑，看到信箱里陈村传来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前面，陈村写了这样几句话：“梅雨天的早上醒来，百无聊赖地走到沙发前又躺下了，撕开新到的一本杂志包装。翻过种种音乐的技术和历史，看到一篇文章。我起来把它一字字地输入电脑，校对了一遍。我把它推荐给你。”

陈村推荐的是《北方人的巴赫》，作者马慧元，我一点也不了解。要不是陈村，我大概就不会读这篇文章。同样受惠的不只我一个，陈村一定是用电子邮件把这篇文章传给了很多人。

我来编年度散文选，抱着和陈村抄、传文章差不多的心情，简单地说，就是把自己看到的好文章推荐给别人看，与更多的人分享和交流。

这里所说的散文，取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除了狭义的叙事抒情之作外，一般所说的随笔和杂感，并不刻意当作文章来写的手札、日记和书简，甚至是访谈和对话，都包括在内的。在意的

是写得好，无论写成什么样式。

说到好，问题就来了。什么是好？你说好就好吗？这很容易问出来的问题，却很不容易回答。

手里没有标尺，心中没有秤。但要说没有个大致的标准，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我也算是个职业阅读者吧，自然也免不了犯点儿职业病。职业病也不都一样，譬如有的人，“专业意识”和“专业标准”特别强，横挑鼻子竖挑眼，排斥性强，看得上的少。我呢，不觉得好文章就应该怎么写或者就是哪些人哪个圈子里的人才写得出，所以东看看西看看，眼贪，都成习惯了，也就生出了毛病：麻木。很多文章从头看到尾，没什么感觉，等于白看了。这叫眼贪心不动。这毛病是很难治的，看得越多越严重，又不能不看，谁叫你以阅读为业呢。幸亏并不总是心不动，还总有好文章能触碰着神经，麻木的中间也有心动的时候。我自己暗地里感谢这些令我心动的文章。要说我有什么编选标准，没法说得那么理性和规范，让我心动，不论是大处还是小处，总该是基本的吧。

选出的文章编排在一起，为了看上去有个眉目，大致分成了几个部分。只是要强调一下，分类是文章选出后才有的，并不是先抱着需要某类文章的观念去挑拣的。

黄裳的《琐记——和巴金在一起的日子》和李辉、杜高的《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处理的都是个人记忆，但一写亲切的日常生活琐事，一述严酷无情的苦难命运，落笔、开口，有轻淡、浓重之分，读者获得的感受自然也会迥异。对于历史的记忆及其叙述，本就该有多种视角、形式和内容。

张承志的《与草枯荣》、费振钟的《失踪的乡间手艺人》、杨延康的《陕西乡村天主教摄影手记》、刘亮程的《荒野上的路》、老威的《赌徒周忠陵》，这长长短短的篇章，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广阔的民间世界，它的人事，它的变迁，它的伤痛，它的挣扎和

沉默，它的快乐、活泼和绵延的生命。

冯秋子、张黎、严锋、马慧元、王安忆、黄灿然、叶兆言和余斌诸位，谈舞蹈，谈文学，谈电影配音，谈音乐，谈词典，谈阅读生活，一篇接一篇读来，颇给人美不胜收的感觉。这一类的文章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我选这几篇，一个重要的理由，也是这些文章和许多同类文章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作者并不只是把他们所谈的东西当作对象来谈的，其中有自我生命的深刻投入，交织着一己宝贵的经验、记忆、情感和思想。

我们讲散文，马上想到的就是叙事和抒情的功能，可是多少年来，大批散文——包括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流传很广的名篇——的叙事抒情是倒胃口的，叙事不踏实，抒情就滥情，就矫情，这种现象到现在仍然触目皆是。这在根子上不是一个写作的问题，不可能只限于写作的范围就得到解决；但我们却可能在写作中发现好的范例，我个人觉得这里选的史铁生的《记忆与印象》、周晓枫的《写给匹诺曹》、朱鸿的《一次没有表白的爱》、阎连科的《想念》，就是好的范例。

欧阳江河的《纸手铐：一部没有拍摄的电影和它的四十三个变奏》，展现出思想的想象力、思想击穿现实的尖锐和思想本身迷人的丰富性。

很多年以前，我还不知道天高地厚，写过两篇谈散文的短文，一篇叫《“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一篇叫《对散文的偏见》，少年气盛地发泄对当时散文状况的不满。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不觉间当年说话的劲头和激情丧失得所剩无几，现在已经不会那么痛快淋漓地指手画脚了。可是我那时候的偏见至今仍在，我就是带着我个人的偏见、我的麻木和我的心动，来编这册散文卷的。

2001年11月12日

目

录

总序	陈思和	
序	张新颖	
琐记		
——和巴金在一起的日子	黄 裳	001
智慧与学术的相生相克	钱文忠	008
我的父亲王芸生	王芝琛	017
孙姨和梅娘	史铁生	026
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	李 辉 杜 高	031
与草枯荣		
失踪的乡间手艺人	张承志	088
陕西乡村天主教摄影手记	费振钟	099
荒野上的路	杨延康	113
赌徒周忠陵	刘亮程	118
	老 威	124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完整”触痛了我	冯秋子	135
好音	张 黎	147
北方人的巴赫	严 锋	155
中国音乐在中国	马慧元	167
	王安忆	171
我的衣食父母	黄灿然	178

午后的岁月 ----- 叶兆言 余 斌 191

记忆与印象 ----- 史铁生 207

写给匹诺曹 ----- 周晓枫 248

一次没有表白的爱 ----- 朱 鸿 255

丁香树笔记 ----- 徐 津 267

想念 ----- 阎连科 277

纸手铐：一部没有拍摄的电影和

它的 43 个变奏 ----- 欧阳江河 311

“9.11”纽约日记 ----- 宋明炜 326

琐 记

——和巴金在一起的日子

黄 裳

五十三年前巴金给我写过一张字，是用毛笔写在荣宝斋诗笺上的，邵可倡《大地理》序中的一段话，

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觉得好像在我自己家里一样，在我的国土里一样，在我的同胞，我的弟兄中间一样。我从没有让我的感情征服了我自己，支配着我的只有那个同胞爱的感情。……

当时，我为文汇报编副刊《浮世绘》，设计了一个专栏，请文化界人士写字，准备陆续刊出。我买了几匣荣宝斋彩色诗笺，留给在北平的吴晗一盒，请他就近请人写字；在上海就从巴金和勒以开始，缠着他们动笔。巴金好像不大赞成这种“风雅”行径，但到底还是同意了。别的人写的大抵是一首诗，他写的则是上面一段话。他说过，他译书，总是选自己喜欢的、同意的作品才动手。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那么，邵可倡的这些

话，一定是他欣赏的，他自己心里的话。

当时巴金住在霞飞坊（今淮海坊），他家来往的朋友多，简直就像一座文艺沙龙。女主人萧珊殷勤好客，那间二楼起坐室总是有不断的客人。那可不是一个小圈子而是大圈子，这从他主编的“文学丛刊”十集的作者群可以看出。我就在这儿抓住过胡风，也给我写过一张字。可惜十年动乱中我收集的一大批墨迹被抄没了，发还时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胡风写的一张理所当然地没有了。

在我的印象里，巴金不大参加朋友们的嬉笑、争论，他总是一个人在三楼的卧室里工作。到了饭时，才被叫下来。披着一件人字呢夹大衣，手里拿着一本书，嘴里念着德文，一面慢慢地从楼梯上踱下来。那时他正在译斯托姆的《迟开的蔷薇》。

住在他们隔壁的是许广平。住得近的则是陈西禾和顾均正，和靳以一样，都是常来夜谈的客人。有些老朋友如吴朗西、朱洗，也有时来，巴金和他们常有争论，有时候辩论得很激烈。我枯坐一旁，始终听不懂他们在讨论什么。萧珊有许多西南联大的同学，如汪曾祺、查良铮、刘北汜，也不时来坐。谈天迟了，就留下晚饭，有时到近旁的美心去叫葱油鸡来添菜。有时陪他们夫妇去吃咖啡，总是附近国泰电影院斜对过的老大昌，而不肯多走几步去 DD'S，虽然那里的咖啡要好得多。因为老大昌的老板过去曾是萧珊家里的旧人。也常去看电影，不过巴金很少同去，总是由我们一些年轻人陪了萧珊前往。靳以就说我们是萧珊的卫星。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抛出了金圆券，一时物价飞涨，早晚市价不同。巴金是靠开明书店的版税过活的，收到的是期票，不能不赶快处理。一次我陪萧珊去取版税，拿到期票以后就赶到金城银行，从诗人王辛笛那里换得现款，坐在三轮车上捧着一袋纸币踌躇无计，只能胡乱买一些日用杂物回来。后来开明书店改变